

從地緣理論看亞太戰略思想建構的歷史觀

何耀光

提 要：

一、戰略研究的基礎在於歷史，歷史的認知緣於地理的結構，歷史脈絡之間的變化若能被充分的理解，則可洞悉長久以來影響歷史發展的「驅動力」，進而能提供究竟何種原因導致歷史事件的發生？而能尋找問題發生的核心因素與影響歷史發展的結構性驅動能量，才能在戰略研究過程中，建立高層次、創造性的戰略思維。

二、我國海軍在戰略思維建構的過程中，由於受陷於「技術層次」的經驗，而難有超越性、全球視野的戰略觀。其中，整體軍事教育體系與思維理則的僵化，係問題的核心。

三、本篇研究，係由地緣理論為引介，介紹「地理人」的「歷史觀」，期透過經典文獻的理解，引發海軍同仁的另一種思維途徑，或許能為建構我國式的「海權理論」，提供些許助益。

關鍵詞：海洋秩序、地緣政治、戰略研究、歷史驅動力

壹、前言

史學家卡爾（E. H. Carr, 1892-1982）曾謂：「歷史是人類運用理性，以理解因應環境的長期奮鬥史。」其認知意味著，歷史是人類對自己的理解，透過自覺而意識到歷史，意識到歷史是如何的受到多種社會因素支配〔註一〕。亦即如同布勞岱（Fernand Braudel, 1902-1985）所強調：「人類若不聯繫過去，就幾乎不能懂得現在」〔註二〕，不能僅關注在歷史的重大事件，而要致力於發現「歷史的結構」，也就是「不受急風暴雨影響，而長期存在的東西」〔註三〕。由於身處西太平洋這個權力糾葛、經濟成長巨大變動的地區，加上海軍生涯所建構的特殊海洋關切，促使筆者在綜觀西太平洋地區之歷史發展過程後，形成基本上的認知：戰略研究的基礎在於歷史，而歷史認知的建構又必須緣於地理的結構，歷史脈絡之間的變化若能被充分的理解，則可洞悉長久以來影響歷史發展的「驅動力」，進而能提供究竟何種原因導致歷史事件的發生？而能尋找問題發生的核心因素與影響歷史發展的結構性驅動能量，才能在戰略研究過程中，建立高層次、創造性的戰略思維。

我國四面環海，但對於海洋與海權的理解與研究，卻受到強烈的大陸性思考所限制，尤其以海權思想之建構與發展來看，遠從清末海軍教育開始，就出現嚴重缺陷〔註四〕，對於海權的研究亦少有突破性、深入、創新的見解，多數論述僅止於馬漢（Alfred Thayer Mahan, 1840-1914）所謂的「發展海權六項要素」〔註五〕。檢視我國海軍對海權意識的教育過程，發現核心問題之一，係將海權概念的建構，簡化為海權史課程，而海權史的教學又以海戰史為唯一核心〔註六〕，在缺乏地緣戰略與國際關係、權力政治的概念下，歷史教育被孤立於戰略思考之外，教育時數亦隨著主管官員的錯誤認知，一再縮減。事實上，歷史的發展有其時間與空間的交錯，在性質上存有兩種近似互斥的特性：時間與因果之間的連續性；個體本身與參與者之間的間斷性。誠如蘭克（Leopold von Ranke, 1795-1886）的「普遍性或共性」概念與「特殊性或個性」概念：在相當程度上，參與歷史的個體係歷史過程中，連結相互之間有歷史聯繫的個體，可辨證出特定的歷史脈絡，以及個體在歷史之中的內在義涵；

至於連續性與間斷性概念，則是探討問題的本質，透過歷史上眾多曲折感人、變化萬千的特性，提供發展宏觀理論模式，超越籠統認知的可能性〔註七〕。理論上，透過地緣政治學的檢驗，可建構描述特定地區或問題時的視野或觀點，進而提供研究者掌握外部事實與關鍵性特徵，來進行思考、分析，此點與大戰略（Grand Strategy）的研究取向類同，關注地理在國際政治的核心影響，將地理因素視為國家行為的驅動力，因此，地緣政治學也被認為是大戰略的思維方法，藉由關注於事務的實質與自變項，提供依據地理因素的恆久特性，以制定大戰略的思考、制定與執行〔註八〕。本研究置重點於海權對西太平洋地區地緣政治結構與秩序的相互關連性，在寫作安排上，依序討論地緣經典理論、長期歷史發展與東亞地緣戰略分析等三個部分的重要學術文獻，再提出相關戰略思考認知與教育上的建議，期能提供國軍在發展戰略解釋、研判，甚或預測的理論時的另一種思維方式。

貳、地緣政治的經典理論

就傳統地緣政治的經典理論來觀察西太平洋地區地緣政治運作，可以發現自二次大戰之後，美國係主導西太平洋地區最重要的地緣政治勢力，而時至今日，美國海軍的戰略設計依然以史派克曼（Nicholas John Spykman, 1893-1943）、馬漢與麥金德（Sir Halford John Mackinder, 1861-1947）等三人的理論，為其全球戰略思維的核心。二次大戰之後，冷戰期間，西方學者以渠等理論思想進行的相關研究甚多，其中不乏以地理為基礎所進行的「大戰略」研究〔註九〕，然而其相關論述的淵源與就整體性、系統化、前瞻性的研究視野來進行對比均不若前述大師的經典著作。茲就三人的學術研究文獻，綜合分析如下：

一、經典地緣政治理論的綜合分析

就史派克曼理論而言，一般認為「邊緣地帶」概念為其理論的精華，故論者多強調「誰控制邊緣地帶，就控制歐亞大陸；誰控制歐亞大陸，就控制全世界」〔註十〕。然而誠如 Leo S. Amery 所言，將特定時空環境下的海陸權衝突，做為歷史發展模式來思考時，心臟地帶的重要性並非由歷史或地理所建構，而是由邊緣地區的羸弱所造成〔註十一〕。因此，史派克曼認為世界上最具權力衝突性的場域是歐亞大陸的邊緣地區，究其原因，不僅因該地為人口與資源的主要集中地，更在研究歷史發展之過程中，發現權力衝突係來自於心臟地帶和邊緣地區的衝突，與邊緣地區內部的權力分佈有關，也與海上勢力對大陸沿岸的壓迫相互連結〔註十二〕。在權力互動過程中，「邊緣地帶」成為歷史變動的核心，是權力競逐的源起。此種理論的修正，意味著國際權力變動模式的樣態：一是海、陸權的對抗；一是海、陸權聯合對抗邊緣地帶的強國〔註十三〕。就理論層次而言，其理論在執行與實踐層面上，更清楚的呈現出權力運作的流程，相對於麥金德理論，更具有實用性。

而麥金德的論述，就理論層次而言，則更加具備大理論的架構，其理論核心指出，現代陸權與海權的差異，不僅源於思想根源，更在於其機動性與物質條件的差異〔註十四〕。而「樞軸」的概念，直接點出戰略議題關切的層次即中東、近東與遠東，除強調「地理環境的支配作用」之外，更跳脫「地理決定論」觀點，提出權力平衡的運作，端賴於地理與人文因素的結合〔註十五〕。至於地球是「封閉系統」的概念，更是其理論之中思維邏輯推理的核心與起點，將世界視為閉鎖空間，指稱地理的物理特性在本質上少有改變，然而相對於人類歷史的影響，則在於人類如何理解與認識地理。事實上，每個時代均有其獨特的地理觀，而封閉系統概念使在地球上任意一處所發生的事件，均會在遙遠的另一邊引起強烈的迴響，而其結果則是

在世界政治與經濟有機體之中，較為薄弱的部分將因此被震得粉碎〔註十六〕。麥金德理論的重大意義即在此概念，以及因此而建立的絕大多數後繼之地緣政治觀點與理論架構〔註十七〕。而筆者更認為封閉的全球政治系統，意味著「地理的終結」與「資源的有限性」，因此，戰爭發生的結構因素亦被定義，而封閉空間以海洋相連結的概念，即成為麥金德在地緣政治學領域位居翹楚的主要原因。

馬漢理論當中，將海權發展與國家經貿問題相互連結，此點是造就馬漢在理論層次上，保持大師地位的重要觀點。惟馬漢雖然被認為是海權理論的祖師、海軍戰略學說的權威〔註十八〕，但嚴格來說，對於「海權」，馬漢並未曾賦予完整的定義與理論架構。就理論分析架構來觀察，其海權思想在精確度（Accuracy）與明晰感（Clarity）上有嚴重的缺陷〔註十九〕。當然，百年前的馬漢理論，係以英國海軍發展的歷史為基礎，時至今日，確實有若干與現代精緻理論相互矛盾與衝擊的部分，亦產生若干理論架構上的結構性缺陷。但筆者認為要檢討馬漢的理論，須由歷史、經濟、科技等三方面來認知。畢竟海權不只是限定在支配海洋的軍事力量，同時亦含括商業與航運〔註二十〕。以此論述來觀察，馬漢係認為武力係用以制海、保障海上商船隊與貿易交通線（航路）之安全，而商船隊則用以開發海外商業市場及經濟利益，厚植國力，平時商業船隊可賺取大量經濟利益，戰時可支援海軍艦隊作戰。馬漢研究海權與陸權之間相互征戰的歷史證據，認為透過嚴密而徹底的海軍封鎖作為，常使海軍更具備決定性的力量。然而，藉由海上武力所致之勝利亦非絕對，只有透過控制海洋，以及對貿易戰略中心位置的長期掌控，貿易破壞的效果才能展現，亦只有透過海上決戰，戰勝敵人艦隊，則制海權才能被有效掌握〔註二一〕。此點雖然明顯的是以「海軍主義」的角度來觀察歷史，但亦不失為「中肯」，也未嘗有盲目的「海軍至上論」的缺陷。

二、地理因素的重要性

史派克曼認為國家規模的大小，以及國家在全球與區域之中的位置等因素，對國家的涉外政策，具有關鍵性的影響。國家機器係藉地理基礎，來進行戰時的運作、動員，以及在和平時期做為佔據戰略位置的基礎，若相較於其他各種不同的因素，諸如人口密度、經濟結構、政府組織、政治人物性格與偏見等諸多因素，地理是最重要、且穩定性最高的因素〔註二二〕。同樣的，麥金德亦認為理性的政治地理學係建構在自然地理之上，政治問題依據地理環境而決定，政治地理的基礎在於人類與其所處環境之間的交互關係〔註二三〕。

就地理因素的本質而言，史派克曼認為位置的重要性比範圍的大小更重要，而其核心原因則在於位置不會改變。但地理位置的重要性，卻是隨著「交通」的意義而具有重新定義的可能，依據交通線、戰爭技術、世界權力中心的相對意義而轉移，特定「位置」的完整意義，係由此特定區域與兩個參考系統之間的關係來決定，其一、是由實質地理位置所獲得的地理參考系統；另一、則為對事實的評估而獲致的歷史參考系統〔註二四〕。至於麥金德則以傳統英國對外政策的思維為例，認為其政策係以地緣位置來決定：由於歐洲大陸外緣的島國特性，加上廣闊海外屬地的形式，致使其對外政策具備兩個基本特點：1. 謀求海上霸權以防衛本土，維持帝國安全與內部聯繫，保護國家賴以生存和繁榮的商業。2. 謀求歐洲大陸的權力平衡，防止歐洲大陸形成單一強權，威脅英國的貿易與海上交通線，進而入侵不列顛〔註二五〕。因此在進行國家戰略的研究與分析時，史派克曼認為國家不能忽視其地理因素，且其外交政策亦須面對所處地理因素，以做為政策執行與修正的參考。地理因素不能忽略的原因是：

它「存在」的事實〔註二六〕。而麥金德對英國處境的分析認為英國是處於歐洲大陸的沿岸，而非歐洲；英國之地位來自於對海洋的控制，而以現代全球視野而言，海洋的統一係建構於海權支配的價值之上，新的權力平衡關係演變，係以英、法、德、俄、美等五國最為關鍵，英國在地理位置上的限制，乃為其危機之根源，挑戰者將是具有廣大領土與自然資源的俄羅斯與美國〔註二七〕。

至於馬漢的論述雖然多數集中在海洋與航路的問題上，然其透過對戰史的研究，融合過去百年的英國海權運作經驗，所發展出來的認知係確認強大的海軍為維繫國家強權的保障，地球表面海洋佔大部分，因之控制海洋即可支配陸地的局勢。換言之，只要控制重要的航道及足以影響海上武力分佈的海上強制點，即可封鎖並支配大陸。至於更核心的概念則是必須擁有龐大之商船、港口及順暢之海上航路，並有海外商業及經濟，才能成為支持海軍發展、建構海洋帝國的基礎。故對於海權發展的條件係認為國家若能掌握：1.地理位置

(Geographical Position)；2.自然結構(Physical Conformation)；3.領土範圍(Extent of Territory)；4.人口數量(Number of Population)；5.民族性格(National Character)；6.政府的性質(Character and Policy of Government)等六項條件〔註二八〕，就可以在其建立國家的海上能力體系(海權)的過程中居於領先、佔上風的地位〔註二九〕。

三、權力運作建構基礎的地理認知

史派克曼所認知的地緣政治世界，是由兩個大陸(歐亞大陸與北美)、三個大島嶼(南美、非洲與澳洲)、五個主要海洋(南冰洋、北冰洋、印度洋、太平洋、大西洋)所構成〔註三十〕。而以全球觀點來看，唯有美國可以直接進入太平洋與大西洋兩個主要海洋〔註三一〕。若依據國家地理位置的屬性來區分，計有「內陸國家」(Landlocked States)、「海島國家」

(Island States)與「海陸雙邊境國家」(States Which Have Both Land and Sea Frontiers)〔註三二〕。其中內陸國家的安全威脅，直接來自於比鄰的其他國家；而海島國家的安全威脅，通常來自於其他的海軍強權，但對於離岸海島國家(Offshore Island States)諸如英國、日本等而言，其威脅還要加上來自於鄰近的濱海強權，因此在處理此類威脅時，這類國家經常以征服或殖民的方式，在其鄰近的沿岸地區，建構緩衝國(Buffer States)，或者在大陸上運作「權力平衡」；至於海陸雙邊境國家在界定其威脅來源時，係依據其海、陸邊境的長短、鄰近的強權或潛在強權，以做為判準因素。對於威脅的界定與理解，史派克曼相當重視「動態的相對關係」。

麥金德所理解的世界，係以整體的封閉體系來思考，在交通技術與運輸工具的變革影響之下，由於「世界島」擁有龐大的人口、豐富的資源等優勢〔註三三〕，故而以「島」的概念來觀察，「世界島」也可以進行海洋的運用與支配，故若世界島上出現不受挑戰的大陸強權，其他海島的強權(亦即海權國家)就將會衰敗。歷史上，資源的掌握與帝國成長之間必定會引發戰爭，欲阻止衝突，則必須理解地理因素，並由地理的現實之中探詢衝突的原因，而其中的脈絡則在歷史之中，故地理學的事實可以由地理特徵對歷史事件造成的影響來評估〔註三四〕。然而儘管世界是個整體，但依然存在某些重要的界線，「心臟地帶」的特殊戰略價值，在於其世界政治樞紐的地位，其地緣政治的意義在於支配東歐者，控制心臟地帶；支配心臟地帶者，控制世界島；支配世界島者，控制全世界〔註三五〕。而將整個權力運作之地理基

礎，建構在對於俄羅斯所佔有的「心臟地帶」之關切上，係麥金德理論之缺憾所在，畢竟「心臟地帶」的戰略價值，並不取決於其本身的重要性，而是取決於國際權力變動模式能否經得起歷史檢驗的問題〔註三六〕。

至於馬漢則專注於強調使用和控制海洋，在現今與過去都是左右世界歷史的重大原因〔註三七〕。就傳統重商主義者的觀點來看「生產」，基本上意味著國家獲致財富的途徑。整體而言，馬漢是以「經濟人」的觀點將生產定義於長時間的社會經濟系統之內，並視之為建構美國社會健全發展的過程，以及充分就業與勞工安定之基礎，因此，龐大的商船隊是帝國發展的「必要條件」(Sine Qua Non)。由於海上貿易是國家致富的最重要途徑，透過貿易以達成民族繁榮與強盛的目標，因此對大國而言，海上活動的自由、控制海洋，成為霸權的基礎。而控制海洋的前提則是國家必須擁有足夠的商品以進行海上貿易，有足夠的商船隊與海外基地，必須發展足以保護海上交通線的強大海軍，以維繫由港口到海上航路、中繼站、與海外貿易基地之間的安全，因此，促成海軍與海權發展的環節在於產品、海運與殖民地，而其背後的驅動能量則為商業利益〔註三八〕。

四、戰略設計的認知基礎

史派克曼認為國際關係即權力關係，而維持國家安全的最好方法在於權力平衡，「對於建立在獨立國家基礎上的國際秩序而言，權力平衡是不可或缺的要素。相對於其他權力模式，權力平衡更能促進合作、妥協及國際法發展，更能維護和平及正義〔註三九〕。」在國際無政府狀態下，權力競逐等同於生存競爭，外交政策的目標是維持國家領土完整與政治獨立，增進相對權力位置是國家對內、對外政策之首要，權力政治的最終形式，表現在軍事力量的支配而國力的組成因素包括領土規模、人口、資源的佔有與生產、經濟與科技的發展、政治系統的穩定、國民精神、軍力、潛在敵人的力量等，欲生存只有盡一切可能在獲致權力的目標上。對美國而言，最關鍵的是「霸權」的確保，亦即思考如何直接維護並保障其「對支配能力所及地區的權力地位之確保〔註四十〕。」故應將注意力關注於全球範圍的權力平衡，亦即大國之間不斷的權力轉移關係〔註四一〕。無窮盡的權力競逐導致戰爭，戰爭並非異象，而是主權國家體系的常態，二十世紀的戰爭，則是專業的軍事、政治、經濟與意識形態之總體戰爭〔註四二〕。從歷史上來看，雖存在海洋國家及其邊緣地區盟友與心臟地帶國家及其邊緣地區盟友間的對抗，以及海洋國家與心臟地帶國家聯手與周邊地區強國之間的對抗等兩種權力對抗模式；但邊緣地帶的權力分佈狀況則決定不同模式的出現時機：當邊緣地帶羸弱時，第一種模式出現的機率提高，而當邊緣地帶強盛時，第二種模式的可能性居多，故「邊緣地帶」為美國在世界政治中的戰略利益之所在〔註四三〕。此論高度顯示史派克曼理論背後的「選擇性」認知，其內涵意義在於，政策與戰略設計時應注意對抗模式並非單一性，而是要依據「利益」進行最佳「選擇」。

麥金德在戰略的探討上，係認為國際權力結構的轉變，直接、間接的影響大陸國家的發展，而地緣政治的現實層面，使得陸權國家有機會發展成全球性單一帝國〔註四四〕。因此從長遠角度看，未來在歐亞大陸上，可能會出現單一的帝國勢力，並以此為基礎，建立海權國家無法戰勝的陸權力量〔註四五〕。隨著交通技術的改進，鐵路對人口、資源甚至軍隊武力轉移運用的連接，係建構陸權挑戰海權的條件〔註四六〕。而從地緣的角度來觀察，則是德國與俄國等兩個潛在陸權力量的聯合。由於長期以來的傳統心態，係認為海權的掌握能確保英國安

全，因此，為強調英國的海上帝國已被威脅的事實，麥金德透過地緣優勢的分析，提出在歐亞大陸心臟地帶由於自然資源潛力雄厚，自給自足的經濟世界將可排拒海洋貿易。且因歐亞大陸過於龐大，而使海權力量無法深入，但鐵路的機動性，卻能使遠距離的軍事投射與經濟影響成為可能，亦造就大陸的威脅性〔註四七〕。即便內、外新月地區是平衡心臟地帶的選項，但依然存在權力的「不對稱」。若由歐亞大陸內部向邊緣地區擴張，利用巨大的陸地資源來建立艦隊，成就世界帝國。因此，面對威脅需推動海上聯盟，以外部的海軍支持陸上部隊，迫使大陸聯盟也部署陸軍，從而阻止其艦隊的建構〔註四八〕。政治權力平衡在於地理條件、經濟、戰略、相對人口、生產力、裝備、人民的競爭組織等，影響人類歷史變遷的重要因素是人類在地理空間中的移動能力，鐵路形成的大量運輸能力係陸權發展的基礎。由此來看，麥金德理論並非「地理決定論」，而是在關注地理因素的同時，將其他因素一併考量，以特定時間的政治力量進行對比，同時將地理因素與其他相關各方，諸如人力、組織、技術等面項進行比較〔註四九〕。因此，無論哪個國家控制「心臟地帶」，地理因素的影響都會使其行為與俄國相差無幾〔註五十〕。

至於馬漢係以「海上力量」來理解戰略的核心，認為海上的軍事力量不僅是以武力控制海洋更包括通商與海運；藉由貿易的需求，海軍艦隊才能逐步發展臻至完善〔註五一〕。海權發展為國家爭取世界霸權的必要條件，建設與發展海軍武力之焦點在於：1. 平時戰略部署的原則是為防禦與準備戰爭的需要，而沿通商航線建立海外基地；2. 確定制海權的戰略原則，即海外基地網絡的建構與強大艦隊的實質存在，著眼於國家權力的擴散，透過對海洋的軍事控制，以長期壓制敵人海上通商的戰略要點，尤其對特定海域長時間的控制；3. 強調艦隊決戰與主力艦隊；4. 武力展示，認為必須充分運用海軍力量達到嚇阻與威懾，以支援政治操作。就目前而言，其重要的思想影響，則應在於馬漢如何抽離歷史事件、形構理論體系的過程。

參、長期歷史發展的檢驗

對於歷史發展脈絡的掌握，係戰略思考的基礎。在當代學術論述之中，有關東亞地區的歷史性作品甚多〔註五二〕。然而，若以地緣戰略的觀點為核心、以西太平洋長期歷史發展背後的驅動因素為探討焦點、同時兼具討論戰略與歷史動能的經典著作，則相對較少。而能以長時期、體系秩序高度來探討的經典文獻則更是少數。

一、歷史發展脈絡與趨勢的理論核心

檢視 1565 年太平洋海上航路被發現之後的歷史發展，可發現權力競逐的連續不斷局面，在強權興衰與交替過程中，確實存在著某種主導事件發展趨勢的力量，以初期活躍於海上的西班牙帝國而言，即在人力、資源、資金限制下，使其太平洋勢力的發展受到嚴重的侷限〔註五三〕。對於歷史發展驅動因素的探索，尤其以「權力」為探討核心的學者之中，筆者認為以華爾茲（Kenneth Waltz）、吉爾平（Robert Gilpin）、保羅甘迺迪（Paul Kennedy）、莫德爾斯基（George Modelski）等人的理論〔註五四〕，對於戰略研究較具深遠影響力。其中甘迺迪即認為國際體系之中，經濟與軍事力量是相對的概念，國際權力平衡是一種動態的關係，世界性戰爭之後的新秩序，代表著國際體系中權力的重分配〔註五五〕。而資源、人力、經濟、政治與科技等因素，則影響著國家的權力興衰。透過經濟與科技的變革，國家的社會結構、政治制度及軍事力量亦產生影響，而國際之間的權力平衡亦為之轉變〔註五六〕。因此，

甘迺迪提出中等區域強權興起與取代的發展模式，並將權力移轉設定在經濟發展的驅動之下，強調經濟和軍事之間的互為因果關係。並認為歷史上的強權必將走向衰敗，其原因是過度的軍事與權力擴張，最後在經濟無法支持的情況下導致衰落，諸如神聖羅馬帝國、西班牙、荷蘭、法國到英國皆然，故由歷史的線性推論來看，美、蘇兩國終究將走向注定的衰敗，而要避免美國的衰敗，在作為上，並不一定要追求絕對的霸權，但一定要保持相對的強勢。對此筆者則認為其論點雖甚有開創性，但歷史是否能以線性的方式預測其發展，實為一大疑問。但即便如此，其以經濟能力與軍事擴張力度做為分析長期歷史發展的驅動能量之因素，對於歷史發展脈絡的掌握，確實亦有相當的詮釋力。

至於莫德爾斯基的「長週期理論」則討論有關霸權國家的興衰與全球戰爭之間的週期性模式，認為歷史上強國之間權力消長的結構性危機，構成威脅體系穩定的全球問題，而解決問題的主要機制即為戰爭。其理論之核心命題係基於海權的全球延伸特質（Global Reach），在特定時期內，居世界領導地位國家的興衰命運，係歷史上不可避免的事實；而全球戰爭的週期性爆發原因，係全球政治體系的結構性危機，其表現方式通常以對領導國家的挑戰與領導權的爭奪為模式，其結果則為新的權力結構與霸權國家的產生。因此，歷史發展的脈絡與模式，即「霸權的興衰」和「週期性全球戰爭的不可避免」〔註五七〕。從體系發展的歷史模式來看，係屬「階段性的變動狀態」（Phase Movement）〔註五八〕，而其變數則為對「秩序」的需求與支配兩種。就「秩序需求」而言，當處於全球戰爭以及戰後的混亂時期，體系對秩序的需求較高，而處於霸權國家的領導地位確立之後的相對穩定時期，則需求性相對較低。就「秩序支配」的變項而言，當處於霸權國家領導權威影響之下，體系秩序即被建立並運作；而當戰爭和權力分散狀態時，則無任何秩序可言〔註五九〕。故對秩序的需求反映出體系的階段性變革功能，而秩序的支配則反映居領導地位國家對體系變化的主導作用。此亦 500 年來長週期歷史，所顯現的世界政治演變與進化。然而，全球戰爭固然是近現代體系轉換的主要模式，但「長週期並非戰爭週期，而是透過全球戰爭的調節而形成的政治發展過程」〔註六十〕。全球政治的演進是在多樣化政策組織的競爭與合作之中達成〔註六一〕。一般的理解與批判係認為，該理論係過度機械性的將領導國與全球戰爭的重複更替，忽視陸權與經濟發展的影響〔註六二〕。然而誠如 Stanley Hoffmann 所言：國際關係理論，「事實上是某種分析性和描述性的結構體；最多能提供一種概念框架和一系列的問題，從而協助分析和解釋某類現象」〔註六三〕。」

吉爾平則認為，霸權國家建立霸權的手段與方式，係建立、管理並控制國際事務以及國際體系的各種國際機制，並以威脅、利誘的作為，迫使其他國家參加該機制，從而建立的霸權體系。而構成對該國際體系統治的基礎因素則是權力分配、威望等級以及統治或影響國家間互動的一系列規則〔註六四〕。長期而言，國際體系內重要國家的利益及其相對權力之維持狀態決定歷史發展趨勢，若權力關係維持原分配狀態，體系就處於平衡狀態。但由於國際體系內部的政治、經濟、科技等發展，必然使成員國之間的權力發展呈現「不平衡」趨勢。權力增長的差異，導致體系內部的權力重分配。隨著經濟、政治和科技的新發展，國家的潛在利益產生劇烈變化，促成企圖改變國際體系的意圖，而此類國家改變國際體系的動力即在於阻止損失或增加收益。證諸於歷史，透過戰爭即決定何者將支配並統治該國際體系。而從長期歷史演變角度來看，歷史發展的過程，可視為「秩序」對大國擴張的限制過程，既定的經濟秩序、

技術水準和其他因素決定特定歷史時期中，政治實體的最適規模。在未達成此規模前，國家所積聚的財力並不足以捍衛其生存；但若超過此規模，則建構該規模的成本將會增加，進而阻礙其擴張，規模負擔和技術能力的不平衡現象，增加體系對新秩序的需求。此種對秩序的需求，使新興國家隨其權力增加，而尋求改變現狀，嘗試改變國際體系規則、勢力範圍劃分、甚至領土的分配。而原本具支配地位的國家則以改變政策、恢復體系平衡等方式來因應挑戰，而戰爭即成為解決失衡狀態的重要選項〔註六五〕。歷史經驗顯示，解決國際體系結構與權力再分配之間不平衡狀態的主要手段是戰爭，歷史上的國際體系都是霸權戰爭之後，領土、經濟和外交重新結盟的產物。戰爭結果造成體系的改變，以適應新的國際權力分配與該體系基本組成的重新安排。歷史上沒有任何一個具支配地位的國家願意放棄其對國際體系的統治，以避免與新興強國之間的戰爭，亦沒有任何例子說明，新興強國不會以其優勢，試圖改變原有體系，以符合安全與經濟利益。戰爭導因於國際體系結構與權力不平衡的狀態，戰爭的結束是另一次成長、擴張、終至衰落週期的開端。不平衡發展的規律繼續將重新分配權力，而此週期亦持續重複出現〔註六六〕。

二、西太平洋長期歷史的地理與經濟因素

就地理位置因素來看，Robert S. Ross 認為地理與結構因素，係維持穩定的首要因素。由於衝突發生的因數：能力、利益與安全兩難，均由地緣因素所形構，故「地緣因素」建構出區域的穩定與秩序。整體而言，大國之間權力平衡狀態的維繫，雖可創造區域秩序，但無法保證無挑戰國家的興起，因此地緣與結構因素對於決策者而言，係能提供一種對未來相對穩定與和平憧憬的自信與作為〔註六七〕。就日本和俄羅斯來說，地理因素的限制，使渠等僅能具備區域影響力，而其成功與否的關鍵，端賴與區域強權的合作關係〔註六八〕。俄羅斯的問題，主要在於其遠東地區與歐俄之間遙遠的距離，日俄戰爭即為歷史上的實例。即便在 1950 年代末期，蘇聯開始對遠東地區進行開發，但支援有限、過度膨脹（Over Expansion），亦造成蘇聯的解體〔註六九〕。對日本而言，地緣的問題係領土規模太小，事實上日本帝國的形成與發展，係建構在中國的分裂與英國的相對衰敗之上，然地理因素使其擴張受到限制，亦導致二次大戰的失敗。然而筆者以為，Ross 的觀點並未明確建構諸多地緣因素之間的相互影響關係。以日本為例，與歐洲人的接觸始於 17 世紀，最後在通商、傳教、軍火供應、甚至介入內戰的背景下，因觸及幕府政權維繫的敏感神經，導致 1640 年代日本以「鎖國」的方式回應外界壓力〔註七十〕。其鎖國作為，雖然使日本退出北太平洋地緣政治的競逐，而留下英、美、俄西四國的海洋霸權爭戰〔註七一〕，但相當程度上亦維繫了近 200 年的國內安定。1581 年俄羅斯人進入西伯利亞（Sibe-

rian）開始，糧食與生活的補給，即成為帝國擴張成敗的關鍵，聖彼得堡（St. Petersburg）對黑龍江的理解，係建構在糧食來源與通商利益之上，與清帝國之間的衝突，則透過尼布楚條約的簽訂而支配後續 150 年的中俄關係〔註七二〕。然尼布楚條約之簽定，導因於俄羅斯當局鑒於歐俄與遠東之間為布里雅特蒙古人（Buriat Mongols）的領地，擔心前線過度延伸將有從中被蒙古人切斷的威脅；而清帝國則關切準噶爾部領袖噶爾丹

（Galdan Boshughtu, 1671-1697）的攻擊，認為當時已在新疆至滿州之間建立強大勢力的準噶爾汗國，足以威脅蒙古、並經由蒙古而威脅到北京。俄羅斯的主要動機是地緣經濟（俄人視清帝國為西伯利亞皮毛的巨大市場且需要滿州的經濟補給力），而清帝國的主要關切

是地緣政治（準噶爾帝國的軍事威脅），這些因素促使清俄兩帝國達成妥協〔註七三〕。上述發展，就「權力梯度之耗損」（Loss of Strength Gradient）概念來看，顯示霸權國家對於遠距離區域的能力，係呈現隨距離的增加而衰減的狀態〔註七四〕，因此，Ross 認為當前東亞衝突的可能性係被地緣因素所限制，強權之間的「權力轉移」亦受約制，「穩定兩極結構」將使中美之間衝突的驅動能力降低，而促使大國之間合作意願最大程度的增長〔註七五〕。而筆者僅同意地緣因素的重要性，但卻無法認同其「中國支配大陸東亞，而美國支配海洋東亞」，兩者可能相互自制而導致「和平」的推論。

至於甘迺迪則認為近代國際體系之特徵表現在全球經濟體系整合的出現、對落後地區征服、工業革命之新科技對戰爭產生影響等三個層面〔註七六〕。地理環境使歐洲城邦分立，貿易、經濟競爭劇烈，而經濟貿易的發展促進軍事進步，進而使歐洲獲致全球性實力，而凌駕其他文明與權力中心，之後隨著海上支配的確立，使歐洲在世界政治舞臺上扮演舉足輕重角色〔註七七〕。歷史發展顯示，新的權力平衡狀態不斷遞變，進入工業化時代後，國家的經濟潛力與軍事實力的相關性增強，人口、都市化、工業化水準、煤鋼產量等指標，均顯現國際政治中權力平衡態勢的變動〔註七八〕。日本雖然在遠東獲致強國地位，但其在資本、武器、工業技術方面均嫌不足。英國雖為世界最大帝國，但工業成長速度不及新興的德國、美國。俄國雖然在人口、土地方面皆稱巨大，但弱點在於人口素質，工業化比率、現代化程度的缺陷。美國固然缺乏龐大的軍力，但因地理環境、經濟優勢、工業成長快速等因素成為明日之星〔註七九〕。一次大戰後，古老帝國瓦解〔註八十〕，國際權力結構大幅變化，英、美、日三國競爭的局面形成，透過華盛頓會議，劃分太平洋與遠東勢力範圍，使局勢稍緩〔註八一〕。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法、義、德、日不再能擠身世界強權，英國的帝國光環迅速退卻，世界秩序「從一個體系轉變成另一個體系〔註八二〕」。美蘇兩極（Bipolar）體系世界正式展開，東北亞地區北歐、南歐和東歐等地都被蘇聯控制，不但形成鐵幕（Iron Curtain）更壯大了中國共產黨但在經濟問題的限制下，其軍力水準依然落後於西方〔註八三〕。冷戰經驗顯示，不管政治經濟制度有多不同，經濟成長率的不平衡遲早會引起世界政治和軍事均勢的變化〔註八四〕。歷史上沒有長存的霸權，若經濟擴張無法支持軍事擴張，則帝國必將走上衰敗。筆者認為甘迺迪過度強調經濟因素以及對歷史發展的線性預測，誠如 Rostow 在書評之中所稱：「將 1945 年後美國的興起與以往歷史上霸權國家的崛起等量齊觀，而把它的衰落過程與英國的情形相提並論〔註八五〕」。此種過度簡單的歷史類推，則為其論證之最嚴重的缺點。另外就大戰略的主體而言，作者的分析仍然忽略弱國、國內政治實體和跨國組織的戰略運用。至於大陸學者時殷弘則提出：甘迺迪在有關國家政治目標與階段性目標之間關係的忽略，認為事實上應注意「達到根本政治目標的每一行動階段上政治目的，嚴格從屬於這根本目標〔註八六〕」。對筆者而言，論述之中的「動態」概念，甚具戰略思考的啟發性，國際政治上沒有絕對的權力，而只有相對應手段的操作。若能理解運作的模式與過程，對於議題的觀察與探討，將更具說服力與解釋力。

三、西太平洋主要國家之歷史發展驅動因素

西太平洋地區的權力競逐狀態，呈現出強權國家興衰交替的特性。當明帝國於憲宗成化 13 年（1477 年），將鄭和七下西洋的檔案史料《西洋水程》等重要文獻悉數焚毀，而終止海上冒險之後，中國即錯失競逐世界舞臺的機會，加上保守的儒家政治，商業活動受到制度性的

限制。然其中資源有限，難以陸海兩路兼顧係為關鍵因素〔註八七〕。至於日本方面，幕府的「鎖國」政策直到美國扣關才改變。而俄國則因地理位置使其先天受游牧民族與波蘭等外力威脅〔註八八〕，始終難於西太平洋地區成就絕對的霸權支配地位。至於英國則因為其地理優勢與經濟利益結合，使其可既維持歐洲的權力平衡，又能強化其在海上之優勢地位，而於1840年代摧毀東亞「華夷世界體系」。最後，美國透過兩次大戰，形構「美國支配下的和平」（Pax Americana），以優勢的經濟、戰略地位填補權力真空，透過國際貨幣基金會（IMF）、國際開發銀行（IBRD）及關貿總協（GATT）等國際經濟組織，建構滿足西方資本主義需要的世界新秩序〔註八九〕。綜觀500年來的歷史發展，權力競逐之標的物包括：位置、商業利益、資源的支配與掌控、軍事優勢與政治影響，而其關鍵因素則在於對區域秩序的設定、維護與挑戰。就顯現在歷史現場的強烈印象而言，恰如「霸權興衰」的論述。

基本上，地理因素是國家行為的思考基礎，歷史上處於有利位置者，自然能較其他國家有更好的發展機會，亦形成早期的文明中心，然繁華的背後亦隱藏著反向力量，當帝國沉浸於「物產豐榮」的迷失之下，亦即意味著「吸引外力覬覦」的隱憂；對於位處邊陲的民族而言在生存因素觸動下，擴張、尋找更適合的生存環境成為早期帝國發展的基本模式。以西太平洋發展而言，當彼得大帝（Peter I, 1672-1725）透過「北方戰爭」取得波羅的海（Baltic Sea）出口之後，歐俄部分的安全即得以維繫，亦促成另一波對西伯利亞的探險，堪察加州的半島（Kamchatka）、阿留申群島（Aleutian Islands）、白令海（Bering Sea）、阿拉斯加（Alaska）陸續被發現，亦引發西班牙的關切。然而對該兩國而言，阿拉斯加與加利福尼亞（California）皆為兩國的「戰略前緣地帶」，在人口、物資均缺乏且距帝國中心數千里之遙的不利狀況下〔註九十〕，雙方均難有所作為，從而將此地區的主控權交予美國。事實上，美國自獨立後，其與英屬及西屬加勒比海地區的貿易即為之中斷，1789年美國商人開始與中國進行貿易，並因此建構「財富」的印象。相對的俄羅斯在北極海周邊的毛皮生意雖有所斬獲，但極需投入更多的資金以進行冒險與探勘，惟當時俄羅斯正分別與土耳其、瑞典爆發危機，在資源不足情況下被迫終止〔註九一〕；相同的地緣因素，亦使其在18世紀的最後20年之內，失去南下北海道（Hokkaido）的機會〔註九二〕，進而使俄羅斯錯過奪取海權的機會。19世紀初的美國，同時擁有相對廣大的土地與大西洋海貿的優勢，在鄉村人口支配下的政治型態裡，繼而成為美國政治決策者的〔註九三〕。美國向西部擴張的行動，震撼聖彼得堡高層而思有所因應，惟其再次受限於距離因素使其行動非但增加國庫支出，更可能危及整個俄屬美洲的商業利益，最後至1824年美俄合約簽訂，俄羅斯同意不擴張其勢力範圍，正式自太平洋東岸的國際競逐之中退場〔註九四〕。至於東亞方面，1830年英國受困於中英貿易的赤字，開始向中國出口鴉片，貿易衝突導致以戰爭收場，然對美國而言，則初期受惠於清政府對英國的禁運，而獲致大量的貿易利潤，之後又藉望廈條約坐享與英國同等之最惠國待遇，形成美國人將中國視為無限潛力市場的認知〔註九五〕。明顯的，20世紀成就美國霸權的重要地緣因素，係在於其位於太平洋的另一端，且週邊無敵對強國的位置優勢，使其得以發展軍事能力，並藉海權將之投射遠方，尤其是對陸權敵人的武力投射能量〔註九六〕。然而這並非建構美國霸權的唯一力量，美國介入西太平洋事務的過程，正如Hedley Bull的分析：強國在建立與維持國際秩序的過程中，須尋求國際社會的廣泛支援，避免過度突顯其特殊地位，滿足正當性與合法性的要求，並與

其他強國協調維持區域的權力平衡〔註九七〕。證諸歷史，由「門戶開放」（Open Door Policy）、「蘭辛－石井協定」（Lanshing-Ishii Agreement）、「華盛頓海軍條約」（Washington Naval Limitation Treaty）、「雅爾達體系」（Yalta System）均明顯看出，美國在設定其國際秩序時的務實步驟。如「魯特－高平協定」（Root-Takahira Agreement）中，美國同意「日本和美國在太平洋地區都擁有重要的外國島嶼，兩國政府都為在該地區有一種共同目的、共同政策和共同意圖所鼓舞〔註九八〕」。在「蘭辛－石井協定」中，雖曾聲明「須保全中國領土主權的完整；凡侵害中國主權的獨立，和工商業均等機會等，美日兩國應協同對付。」但卻承認日本在中國具有特殊的利益、在中國「得享有特別權利〔註九九〕」。其運作模式與史汀生（Henry L. Stimson）的「不承認主義」（Doctrine of Non-Recognition）相同，就是不願在能力尚且不足以超越敵手前發動戰爭，進而危害美國利益。

筆者認為，驅動西太平洋歷史發展的動力，地緣因素係屬結構性因素，生存與發展的需求構成原始的動量。不同地緣政治競逐者的生存發展需求，形構中、日、俄等鄰近國家對區域內海洋秩序主導權的爭奪，及至西方海權國家勢力進入之後，在其特殊國際體系與秩序理解傳統下〔註一〇〇〕，國際秩序的建構就是以國際社會中主要行為體為核心，而規範出來的以強國為中心的權力支配、利益支配、與觀念支配。霸權國家透過特殊時空背景下所建構的特定國際機制，形成「霸權支配的秩序」，進而對國際社會行為產生影響，而國際機制則依據霸權利益來組建國家之間的互動關係〔註一〇一〕。確立對國際秩序的掌控，即確立國際霸權之地位。而西方海權國家在西太平洋建構的秩序，係以海權為思考，透過海權運作，建立在政治、經濟、軍事等各方面超越體系諸國的絕對優勢。在平時（霸權主導秩序時期）持續以經貿網絡增長其實力，並透過實力控制機制運作，以保證利潤的獲得；在戰時（挑戰國家興起時）透過海洋控制、同盟運作、武力投射，擊敗挑戰國家。證諸於歷史，二戰後美國透過布雷頓森林體系（Bretton Woods system）的建立，形構其依據自身利益與意圖而塑造的國際經濟秩序〔註一〇二〕，以控制、管理世界經濟，確保美國利益。而在安全領域上，美國主導建立聯合國，並確立安理會的權威與大國決定的原則，從而確保美國的國際政治地位；在軍事領域，透過在世界各戰略要地建立的軍事基地，形成保障自身利益、權力資源支配的戰略網絡，另透過美國文化與價值觀念的擴張〔註一〇三〕，形成主要以美國政治－文化為主體的觀念認知，反映出美式政治結構與組織原則，並依此系統規則約束並規範他國家行為，藉由公共財的提供，引誘並迫使他國遵循該等行為規範〔註一〇四〕，形構美國霸權體系。而歷史的發展模式則在於：不同時間、地點，挑戰國家或國家集團與美國，在不同時間與不同盟國之間展開權力競逐、分化與重構。

肆、東亞地緣戰略分析

古代帝國由於統治工具的不足，故未能發展出統馭全世界的力量，其影響力與利益的範疇亦有所限制，全球規模的國際體系並不存在。15世紀的「地理大發現」，標示著藉由航海網絡所形構的連結，使全球規模的貿易體系成為可能。工業革命、運輸革命、通訊革命的相繼發生，使體系內部的聯繫趨於緊密，最終造就出以全球為規模的國際政治與經濟秩序。維持該秩序的戰略手段，基本上是一種「政治、軍事」與「經濟、機制」的交替使用模式。

一、國際權力競逐的歷史發展模式

綜觀 500 年來海權國家發展的歷史，可發現海洋強權之間的互動關係，與帝國內部經濟與海

權發展之間的圖像，係以海軍力量的大小，做為海洋國家對國際之間投射權力的指標。而全球性戰爭的引發與終止，可做為研究國際政治的權力分析基礎，能使研究者對於事件發展的驅動能量與歷史發展途徑之間，建構清晰的理解。莫德爾斯基與 William Thompson 即以戰爭為軸心，區分五個全球性戰爭的時期，包括：1494-1516 年的義大利與印度洋戰爭（Italian and Indian Ocean Wars），1580-1608 年的荷西戰爭（Dutch-Spanish Wars），1688-1713 年的路易十四戰爭（Wars of Louis XIV），1792-1815 年的拿破崙戰爭（the Napoleonic Wars）以及 1914-1945 年的兩次世界大戰（World Wars）〔註一〇五〕如附表。並藉由戰爭來研究國際政治體系的發展，以發現權力競逐週期性變化關係：各時期之中係由某些具備強大實力的強權所形構的國際秩序所規範，而參與秩序規範的強權國家數量變化，自 1494 年至 1914 年之間，參與國家的數目由少漸增。由原先的葡萄牙、西班牙、英國、法國轉而由荷蘭取代葡萄牙，再進而加入俄羅斯，接下來荷蘭與西班牙被排除，最後美國、德國、日本的加入而在一次大戰前成為最多的六國，二次大戰結束後英國、法國、德國、日本同時退出權力競逐，使世界強權支配的爭奪，形成兩強相爭的局面〔註一〇六〕。而建構海上強權的基礎與工業技術能力息息相關，以 1906 年完成的無畏級戰艦為例，該等海軍技術與武力的發展，係「戰艦支配」的極致表現，而英國在無畏級戰艦技術上的優勢，實為遏制德國海軍發展與挑戰的利器，亦為導致一次大戰勝利的重要因素〔註一〇七〕。西方海洋國家傳統上的認知，係將海軍艦隊的噸位與國家工業能量之間以相等同概念來連結，而國家之間係以該種能力的競爭來取代國際合作的理想〔註一〇八〕。以西方世界史觀來看，支配理論與海洋發展的概念係一種相當接近的連結關係，對現代國家而言，掌握制海、掌握全球性權力；領導地位取決於海權的大小，國家或帝國的興衰與該國的跨海權力投射能力、對貿易航線的支配能力、河岸與港口的開發等，均密切相關〔註一〇九〕。而此等分析，雖不具備放諸四海皆準的通則性，卻提供西方戰略思維過程中重要的指標。

二、海權觀點的權力平衡佈局

權力平衡理論內容與其實踐的現實特徵係：在競爭性的國際體系中，最理想的安全狀況是成為對手無法挑戰的霸權國〔註一一〇〕。由於國際政治的本質是強權的競逐，故 Hans J. Morgenthau 說：「無論國際政治的最終目的為何，其最直接的目的則為權力〔註一一一〕。」華爾滋認為，在無政府狀態下，由國家所組成的任何系統都會傾向於權力平衡狀態的發展，若「權力出現失衡，無論支配者為何，都是潛在的威脅〔註一一二〕。」因此，現實主義者多數同意，國家處於權力競逐的世界之中，為避免其他霸權國家的出現而危害自身安全，必然會採取某種政策措施來抵消他國的權力威脅，於是，國際關係的實踐面向，就存在相對國力的權力平衡狀態。而在海洋戰略的設計當中，權力平衡佈局是一種「動態」的概念，海權運作的「秩序建構」與陸權的「土地佔領」概念有所不同。其所強調的核心內涵在於透過對大陸強權之間的權力平衡運作，設定以經貿利益為核心的政治操作規則，規範與大陸強權間的競和關係。觀察「權力平衡」的歷史發展模式，可以發現由多極平衡轉向兩極平衡的趨勢。在多極平衡時期，大國之間的緩衝操作頻繁，但當利益直接衝突發生時，較大強權國家將積極搜尋發展兩極平衡的機會，而當緊張升高、軍備競賽顯現之時，考驗平衡的危機將陸續出現〔註一一三〕。在陸權與海權理論的論戰之中，陸權論者認為戰爭勝負取決於陸軍的佔領，海權僅具備支援角色；但海權論者以一次大戰等歷史經驗論證，認為即便英國在陸上失敗，

但戰爭依然可以持續，但假若海上遭遇決定性失敗，則戰爭必然失敗。另百年以來，歐洲的向外擴張，以及因之而帶來的財富、權力、榮耀，均建築在海上航路的維繫與控制基礎之上。19世紀英國的海權力量，恰為歐洲權力平衡維持與英國支配的全球貿易系統，提供存在發展的可能〔註一一四〕。海洋戰略的重要性，在於使戰略運用與外交、經濟等，共同建構國家的大戰略與體系架構，並得以使「權力平衡」在其中運作〔註一一五〕。證諸於西太平洋的歷史發展，19世紀末的東亞權力分配呈現巨大轉變，甲午戰爭後日本取代清帝國成為東亞強權，美國則以夏威夷的併吞與佔領菲律賓回應之〔註一一六〕。但受限於在西太平洋沒有海軍能與英俄日對抗，陸軍又忙於應付菲律賓叛亂，促使美國提出「門戶開放」的主張〔註一一七〕。對日本而言，地緣情勢在俄羅斯勢力入侵滿洲之後更形艱險，然獨立對抗俄國依然有困難；此時英俄因東方問題而引發的中亞「大競賽」持續牽引倫敦的關注，一方面在維繫大英帝國在東亞的利益，一方面則欲封鎖俄羅斯太平洋的出口，英日兩國在各自有利狀態下，於1902年簽署「英日同盟」(Anglo-Japanese alliance)，亦為日本發動日俄戰爭完成先期準備〔註一一八〕。對美國而言，日俄戰爭意味著戰略三角的另外兩邊正在自相殘殺，實力消滅的結果將有利於美國，而為終止戰爭而召開的普資茅斯會議，則清楚的顯現權力平衡安排〔註一一九〕。二戰之前，美國對於日本的擴張行為，相當程度上採默許的態度，聽任日本對朝鮮、中國、印支半島的侵略，係為其東亞海洋戰略利益考量的結果。而當日本不能謹守其在東亞大陸的勢力範圍，將其擴張方向轉向英國與荷蘭在東南亞的殖民地時，美國即對日本採取嚴格的禁運措施〔註一二〇〕。明顯的，英美等海權國家操作的「權力平衡」策略，其目的係防止霸權的出現，避免體系中出現擁有過多權力的國家，以至能主宰其他國家，並藉此確保以主權國家為基本單位的西歐國際體系之穩定延續〔註一二一〕。筆者觀察認為在實際的政策與戰略操作上，海權國家的思維表現出高度的彈性，而其核心的考量則以「資本主義體系」的利益為依據，置焦點於貿易網絡的建構與海洋秩序的維持，在力量不足以支配地區勢力時，聯合其他國家共同維繫此「資本主義網絡」，而其目標則是在國際貿易與投資等面向上，實踐「門戶開放」的策略，以便「美國能夠確保獲得原料和市場〔註一二二〕」，及至羽翼漸豐則開始建構其利益專屬的「海洋秩序」。以二次大戰後的西太平洋而言，透過此種「秩序」的建構，美國確立其國際領導地位，在體系內其他大國與國際社會的普遍承認下，多數國家在政策、特定議題上，必須考慮美國觀點，甚至放棄部分主權與獨立行動的自由，在國際事務上配合美國的行動、目標與方法。世界警察、世界領袖的正當性由此而建構，亦因此而使美國與其他國家之間的關係更趨於複雜化，甚或對立之開始。這種美國式的「世界秩序」建構，亦令人以「霸主」或「新帝國」的方式來理解與界定美國〔註一二三〕。

三、海洋戰略設計層面的觀察

由海權史的角度看，歷史研究的目的係提供實用的依據，以做為開發知識的工具與方法，進而能對戰略的本質加以理解，並做為戰略研究的必要過程〔註一二四〕。以西太平洋歷史發展而言，不同時期的主導國家設定出不同的區域支配戰略。當西方海洋國家以經濟利益為出發，粉碎原本的華夷秩序之後，西太平洋的權力爭奪，形成日俄英美相互競逐的局面。若以權力政治的角度觀察，地緣因素限制日本的擴張，為增加對資源之控制而展開的擴張行為，相對也加深對資源需求的壓力，以1939年日本所需的軍事物資與裝備為例，91%仰賴進口，又以對美國在廢鐵、鋁、鎳與石化產品之需求最高，亦因此導致日本對東南亞的佔領與太平

洋戰爭的爆發。日本在自給自足上的失敗，雖導因於國際情勢，然更重要者在於其國內系統的唯一目標是擴張戰略，在此狀況下，日本政府高度介入戰略資源的運用，亦因此無法同時完成專制統治與對美國的競爭，亦造成其在與美國爭霸過程中的困境，最後在二次大戰時遭致戰敗的命運〔註一二五〕。

首先就日本而言，透過甲午戰爭，日本正式取得參與權力競逐的資格。事實上，日本的軍事帝國主義自明治維新之後即已形成，以頭山滿為首的不滿士族組成黑龍會等右翼團體，標榜天皇崇拜和國權主義，鼓吹吞併朝鮮、侵略中國，「西南戰爭」之後，改採在政府、軍部內爭取同情的政策，逐步「塑造公眾輿論」，使之「贊成侵略〔註一二六〕」。諸如山縣有朋（Yamagata Aritomo, 1838-1922）即強調決不能讓清廷或任何歐洲列強控制朝鮮，而必須使之成為日本的勢力範圍，在列強競爭的環境中，日本的安全建構在極端民族主義與強權政治觀的結合，亦即帝國主義〔註一二七〕。甲午戰爭的勝利，使日本得以要求攫取朝鮮、遼東半島與台灣，其中遼東半島係維護對朝鮮控制的保障，台灣則為進入南海、菲律賓、荷屬東印度群島的基地，兩相結合即造就能與大英帝國相媲美的「大日本帝國〔註一二八〕」。1895年之後，日本藉著統治台灣以及在朝鮮半島伸展其影響力，進而攫取在華勢力範圍，並與其他列強進行協調，以維護各自在亞洲的利益〔註一二九〕。然其中主要的挑戰來自於俄羅斯，透過與英國的結盟，使日本於1905年擊敗俄羅斯，躍上世界列強的舞台。對於日本帝國海軍（Imperial Japanese Navy, IJN）而言，自「明治維新」至1922年「華盛頓海軍條約」簽定之間，由幾艘小船發展成世界第三的海軍大國之過程，係日本近代社會多元發展與帝國主義發展之總和〔註一三〇〕。甲午戰爭係海軍發展的重要契機，戰爭不僅改變國會原本對軍費的反對態度，且因清帝國的巨大賠償，使得海軍建設經費暴增，亦使帝國海軍在實質上獨立於陸軍之外，造成軍種間衝突的加劇。日本海軍以創造典範、象徵等方式，將日本的現代化與海軍印象相連結，故在戰爭的光榮勝利以及對公共關係的處理上，均造成海軍在公眾印象中優於陸軍〔註一三一〕。但日俄戰爭的效應反射在海陸軍之間的關係變化，卻使得有限資源的競爭白熱化與戰略方向的傾軋。陸軍關切來自於俄羅斯的報復，而海軍則將美國視為其未來的敵人，軍種間對有限資源的競爭，反映出地緣認知的差異。1916年，日本政府通過帝國海軍建軍重要的「88艦隊」預算，其結果使日本可支配資源大增，進而由債務國轉變成債權國，然而，同樣因為預算與資源問題的考量，以及理解到戰爭係工業、經濟與社會等方面的綜合考驗〔註一三二〕，促使日本認知到無法與資源豐富的美國進行軍備競賽，故而在華盛頓海軍會議之中，接受5：5：3的海軍力量分配比例。換取英美承諾不在西太平洋地區新增或擴建海軍基地的讓步，因而使日本海軍在西太平洋地區保持地緣戰略上的巨幅優勢。然至1933年底，日本歷經10年的低調發展，使其艦隊力量幾乎達到美國海軍的80%〔註一三三〕。海軍大臣大角嶺生即主張若美國採取強硬立場反對日本的基本政策，則日本必須堅決抵制，為此，日本必須繼續完成海軍準備，亦必須脫離現存條約之中的不利限制因素〔註一三四〕。日本退出「倫敦裁軍會議」後，即擺脫裁軍條約的限制，軍備競賽開始，也意味著美日終將為爭取建構各自的「海洋秩序」而引發戰爭的歷史必然性。

對美國的戰略設計而言，日俄戰爭的結束意味著明顯敵人的出現，故自1907年開始，美國的戰略研究就以日本為主要對手，之後於1914年完成著名的「橘色作戰計畫〔註一三五〕」。由於美日雙方均無足夠的實力，以挑戰對方在太平洋的權力支配，因此相互妥協成為選項。一

次大戰後，美國在西太平洋地區並未建構新的國際秩序，而是透過華盛頓海軍會議、九國公約等國際機制與日本分享權力，但其中機制運作的關鍵則建立在美國認知與日本文人政府之間不穩定的誠信基礎之上〔註一三六〕。1920年代末期，中國的統一與蘇聯政局的底定，在西太平洋形成對日本的威脅，然而日本經濟景氣的衰退伴隨天災地震等影響，以及門戶開放政策的名存實亡，均顯示新的權力競逐正在積極醞釀之中〔註一三七〕。以海軍軍力的對比而言，日本海軍經費支出在國家總預算的比例逐年提升，由1914年的13%上升到1921年的33%〔註一三八〕，統計

1922到1933年間，美國新建造40艘戰艦，而日本則建造164艘，英國建造148艘；在輕型巡洋艦上，英國擁有34艘，日本18艘，美國海軍僅10艘。因此，1934年2月小羅斯福總統（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1882-1945）希望依華盛頓條約的艦隊比例提出新條約，將各國艦隊的總噸位數削減20%〔註一三九〕。然日本則堅持新約必須取得海軍平等發展的基礎，在各方無法妥協下，日本退出倫敦海軍裁軍會議，而英、美、法等國則依舊簽訂限制海軍軍備條約，形成自我約制情況，直到1937年底，小羅斯福才決定擴大海軍發展計畫。整體而言，二次大戰之前的西太平洋戰略態勢發展，可以簡單的歸納為：在強權妥協下，創造出日本得以支配西太平洋秩序的環境。由於英、美的協助與默許，透過日俄戰爭，日本取得朝鮮與滿州的控制權，取代俄羅斯在此的鐵路、基地與貿易的權利，一次大戰與蘇聯革命，使日本取代德國在中國的特權，並鞏固其在滿州的控制，進而在1930年代與1940年代初期向中國與中南半島擴張，引發太平洋戰爭〔註一四〇〕。

伍、結語

整體而言，西方海權國家的海洋秩序安排，係以地緣因素為核心考量，對於西太平洋的理解，在遠距離與貿易雙重考量下，以「地理人」的概念進行「經濟人」的思考。事實上，國內的學術研究少有觸及此類議題的探討，少數論及海權戰略思考的安全研究類學術作品則置重點於「經濟人」的理解；而海軍方面，則多數陷於技術性議題，而難能突破，進而呈現「全球性思維」的「海軍思考本色」。以筆者個人的經驗與觀察，認為整體軍事教育體系與思維理則的僵化，係問題的核心。本篇研究係預由地緣理論為引介，介紹「地理人」的「歷史觀」，透過經典文獻的理解，引發海軍同仁的另一種思維途徑，或許能為建構我國式的「海權理論」提供些許助益。

綜合前述，筆者認為回溯西太平洋地區歷史發展的足跡，可歸類三種模式。首先，當東亞大陸帝國勢力強大時，帝國中央政府在經濟與商務需求所建構的實質與慾望層面上，對西太平洋海洋秩序的建構，就存在主導的意圖與能力，但畢竟能力受制於資源的侷限，而無法完全投入（因為必須保留部分資源應付北方遊牧民族），故僅能以「朝貢貿易」的方式，建構一種非完全依靠正式海上武力（海軍力量）維繫海洋秩序的方式，而是藉由海貿與交易規則、航海與造船技術、巨大利潤與吸引的大量人口，而形構成特殊的「朝貢貿易式的海洋秩序」。

其次，當東亞大陸帝國勢力相對衰弱時，由於北方遊牧民族直接威脅帝國存亡，海洋經營的意願與能力相對減低，誠如John E. Wills的「週邊歷史」（Themes in Peripheral History）觀念〔註一四一〕，當大陸體系結構鬆弛或軟弱時，海洋中國的政策思想雖依然存在，且具有相當的影響力，但海洋政策本身在中國社會中卻也存在著兩大限制因素：一是、

中國王朝位於大陸，其政經重心也在大陸，雖然濱海，但海洋的地位卻只能處於邊緣地帶。二是、海洋環境受勢力不易結合與動員能力不足的影響與限制，使得海上勢力難以持續反而逐漸衰竭〔註一四二〕。因此，大陸週邊的緣海國家（海島國家），即能乘隙建構新的反華夷式西太平洋海洋秩序，但由於市場依然在東亞大陸，以及地理上過於接近大陸帝國，與島國本身在人口、資源、貿易線等問題的限制，終究難以長期獲致「絕對海權」的利益，而在「競爭海權」的過程中，逐漸消耗能量。

西方海權國家開始進行殖民擴張之時，由於海權國家係以生產（Production）、航運（Shipping）、殖民地（Colonies）為要素〔註一四三〕，而來建構其海洋秩序概念，故當其進入西太平洋海洋區域之後，由於對東亞大陸帝國並無領土野心，僅有貿易需求，因此在不挑戰大陸帝國生存利益的前提下，透過其海權的力量，以海軍武力為後盾，建構其海權式西太平洋海洋秩序。並以此發展出特殊的歷史發展模式，諸如「鴉片戰爭」、「黑船事件」、「門戶開放」、「蘭辛—石井協定」、「雅爾達體系」等等。例如亞太「門戶開放」原則，係自 1850 至 1870 年代以來，美國在太平洋地區擴張行動的基礎，亦為美國亞太政策的長期基本價值觀。其戰略核心構想主要在以控制海洋為前提的商業發展之上，係透過商業擴張而非軍事征服與領土兼併，來達成其「維護在該地區的巨大利益」之目的〔註一四四〕。亦即今日，美國在面對「中國崛起」的情勢下，所設定的「美國海洋利益與中國陸權利益之間，相對穩定的兩極體系」的認知〔註一四五〕。

至於，軍事教育體系而言，事實上，目前以技術導向的教育方式，並不足以培養全球性戰略思維的軍事幹部。以海權思考的建構為例，其中關鍵性的地緣因素與國際安全等理解，均須以具備豐富的地理與歷史概念做為基礎，才能進而探討「權力關係」以及因應此關係而衍生的「戰略性思考」。然而，若基礎教育之中不予加強，而辯稱「美國海軍官校亦無此課程」，則非但是理論邏輯上的誤解，更是缺乏對於西方海權傳統與教育體系的認知。畢竟，我國傳統上就缺乏系統化的海權認知與論述，長期以來的聯考、分組制度，使海軍軍官的來源，自始即欠缺歷史與地理的基本常識，若再以放任「自學」的態度，則海軍的戰略思維，勢將難以在可見的短期內，有大規模的進步空間。

註釋：

註一：Harriet Swain 著，黃中憲譯，《歷史大哉問》（台北：三言社，2006 年），頁 268。

註二：Fernand Braude 著，顧良、張慧君譯，《資本主義論叢》（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1997 年），頁 121。

註三：同前註，頁 161。

註四：相關問題參見何耀光，〈軍事史教育與戰略教育相關性研究〉，《軍事教育專案研究計畫》，國防部人力司（2003 年 12 月）；何耀光，〈我國近代海軍教育演變之研究－權是學觀點之理解〉，《中華軍史學會會刊》第 11 期，2006 年，頁 123-154。

註五：舉例而言，個人任職海軍軍史館期間，曾於民國 89 年統計自《海軍學術月刊》創刊以來，軍史館當時典藏之相關文章，有關論及海權議題類之文章近兩百篇，其中將近有七成作品只對馬漢的六個海權條件有所著墨，似乎此六點就是海權的精義，而幾乎未曾發現有從地緣戰略觀點而來的核心認知。

註六：依據海軍軍史館內典藏資料（38年班至85年班統計）統計發現，海軍官校有關海權與軍史部分之教學僅包括；海權史自39至56年班及61至85年班，海戰史自42至48年班，軍事史38年班等。相對於各年班平均上課學分數131.71學分，有關海權與軍史部分僅1.4學分，課程比重僅佔1.06%。而以使用時間最長的教材（段祐泰教授編著）為例，其中列舉自1571年的勒本多海戰到1944年的雷伊泰海戰共27例，其中僅有大東溝海戰（甲午海戰）乙項為中國海軍參加的海戰，非但學生缺乏歷史的情感，而且多數戰史發生於帆船時期，在缺乏西洋史背景與世界地理概念下，學生的一般反應僅只於「聽故事」。

註七：相關論點見Leopold von Ranke, "The Great Powers", in Georg Iggers and Konrad von Moltke ,eds.,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History* (Indianapolis: Bobbs-Merrill, 1973) ,pp.65-101; Friederich Meinecke, translated by Douglas Scott, *Machiavellism: the doctrine of raison d'etat and its place in modern history*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1957) ,Chapter 15.

註八：Gearoid O Tuathail, "Problematizing geopolitics: survey, statesmanship and strategy", *Transactions of the Institute of British Geographers* , Vol.19,No.3, September 1994 , pp. 259-271.

註九：例如Geoffrey Parker, *Geopolitics: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London: Pinter, 1998); Robert Strausz-Hupe, *Geopolitics: The Struggle for Space and Power*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1942); Colin S. Gray, *The Geopolitics of the Nuclear Era: Heartland, Rimlands, and the Technological Revolution* (New York: Crane, Russak, 1977), and Colin S. Gray, *The Geopolitics of Superpower* (Lexington: University of Kentucky Press, 1988).

註十：Nicholas J. Spykman, *The Geography of the Peace*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and Company, 1944) , p.43.

註十一：Leo S. Amery, "The Geographical Pivot of History: Discussion," *The Geographical Journal*, Vol. 23, No. 4, 1904, p.440.

註十二：Nicholas J. Spykman, *The Geography of the Peace*, op. cit., pp.40-41.

註十三：Arthur R. Hall, "Mackinder and the Course of Events," *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Vol. 45, No. 2, 1955, p. 115.

註十四：Halford J. Mackinder, "The Geographical Pivot of History," *The Geographic Journal*, Vol.23, No.4, 1904, p.433.

註十五：Ibid., pp.421-437.

註十六：Halford J. Mackinder, *Democratic Ideals and Reality: A Study in the Politics of Reconstruction* (Washing DC.: National Defence University Press, 1996), pp.21-23.

註十七：Saul B. Cohen, *Geopolitics of the World System* (Lanham: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Inc., 2003), p. 19.

註十八：George Modelski and William R. Thompson, *Seapower in Global Politics, 1494-1993*(London: The Macmillan Press, 1988), p.4.

註十九：其理論缺陷，包括：1.理論定義與政策建議的糾結；2.政治與歷史描述時，在彼此的聯貫與時間的延續問題上，立論薄弱；3.軍事與軍費問題並未加以連結；4.戰略思想躁進，戰術概念抽象。此現象尤其出現在定義的方式上，基本上其所謂定義僅為現象的描述而其中海權六要素則近似於政策之建議，有關理論分析架構參考Herbert Rosinski, *War, Strategy and Maritime Power*(New Jersey: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1977).

註二十：Alfred T. Mahan, *The Influence of Sea Power upon History, 1660-1783*(Boston: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1890), p. 28.

註二一：Ibid., pp.538-539.

註二二：Nicholas J. Spykman, "Geography and Foreign Policy I,"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XXXII, No. 1, 1938, p.29.

註二三：Halford J. Mackinder, "On the Scope and Methods of Geography," in *Democratic Ideals and Reality*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1962), p. 213, 214, 217.

註二四：Nicholas J. Spykman, "Geography and Foreign Policy I," *op. cit.*, p.40.

註二五：邵永靈、時殷弘，〈麥金德與盎格魯－撒克遜民族的恐懼〉，《歐洲》，1997年，第6期，頁8。

註二六：Nicholas J. Spykman, "Geography and Foreign Policy II,"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XXXII, No. 2, 1938, p.236.

註二七：Halford J. Mackinder, *Britain and the British Seas* (Westport, Conn.: Greenwood Press, 1969), pp. vii, 12, 350-51, 358.

註二八：Alfred T. Mahan, *op. cit.*, pp. 28-29.

註二九：Ibid., pp. 88-89.

註三十：史派克曼認為1938年的世界權力中心則是：由中東到愛琴海、地中海、西歐與大西洋所構成的帶狀區域，期間有四個主要的權力核心，支配著不同的區域，美國支配美洲、日本支配遠東、蘇聯支配歐亞大陸的心臟地帶、歐洲支配東大西洋與印度洋。

註三一：Nicholas J. Spykman, "Geography and Foreign Policy I," *op. cit.*, pp.43-45.

註三二：Nicholas J. Spykman, "Geography and Foreign Policy II," *op. cit.*, p.214.

註三三：Halford J. Mackinder, *Democratic Ideals and Reality*, *op. cit.*, pp.46-47, 49.

註三四：Ibid., p.3.

註三五：Ibid., p.106.

註三六：Brian W. Blouet, *Geopolitics and Globalization in the 20th Century* (London: Reaktion Books, 2001), p. 51.

註三七：Alfred T. Mahan, *op. cit.*, p.3.

註三八：Ibid., pp.25-28.

註三九：Nicholas J. Spykman, *America's Strategy in World Politics*, op. cit., p.7, 472.

註四十：Ibid., pp. 17-19, 458-460.

註四一：Ibid., pp. 20-21, 24.

註四二：Ibid., p. 25.

註四三：Ibid., p.476.

註四四：Halford J. Mackinder, *Democratic Ideals and Reality*, op. cit., pp. 1-2.

註四五：Ibid., pp.49-50.

註四六：Ibid., p.80.

註四七：Halford J. Mackinder, "The Geographical Pivot of History," op. cit., p.434.

註四八：Ibid., p.436.

註四九：Geoffrey R. Sloan, *Geopolitics in United States Strategic Policy 1890-1987* (Brighton: Wheatsheaf Books, 1988), p. 58.

註五十：Geoffrey Parker, *Western Geopolitical Thought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London: Croom Helm, 1985), p.23.

註五一：Alfred Thayer Mahan, op. cit., p 22.

註五二：若排除官方文獻、回憶錄、學術論文等，僅以出版書籍而言，其數量之多，實難以一一回顧，例如以歷史為主軸者 Akira Iriye, *Across the Pacific: An Inner History of American-East Asian Relations*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1967); George W. Baer, *One Hundred Years of Sea Power: 1890 - 1990*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John King Fairbank, Edwin O. Reischauer, and Albert M. Craig, *East Asia: Tradition and Transformation*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78); Paul M. Kennedy,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 Economic Change and Military Conflict from 1500 to 2000*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87); Robert S. Ross, ed., *East Asia in Transition: Toward a New Regional Order* (New York: M.E. Sharpe, 1995); Walter A. McDougall, *Let the Sea Make a Noise: A History of the North Pacific from Magellan to MacArthur* (New York: Basic Books, 1993)，又如以戰爭、危機等事件為主軸者 Burton I. Kaufman, *The Korean War : Challenges in Crisis, Credibility, and Command*(New York : McGraw-Hill Book Company, 1986); Christopher Thorne, *The Limits of Foreign Policy: The West, the League of Nations, and the Far Eastern Crisis of 1931 - 1933* (New York: G.P. Putnam, 1973); J. H. Kalicki, *The Pattern of Sino American Crises: Political and Military Interactions in the 1950s*(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5); James William Morley, ed., *The Fateful Choice: Japan' s Advance into Southeast Asia, 1939 - 1941*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0); Thomas J. Christensen, *Useful Adversaries: Grand Strategy, Domestic Mobilization, and Sino-American Conflict, 1947 - 1958*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6)，另如探討強權之間關係、戰略設計、海權等 Francis P. Sempa, *Geopolitics: From the Cold War to the 21st Century* (New Brunswick: Transaction Publishers, 2002); John Baylis and Gerald Segal, eds., *Soviet Strategy* (London: Croom Helm, 1981); Mike Mochizuki, ed., *Toward a True Alliance: Restructuring U.S.-Japan Security Relations*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1997); Robert S. Ross, ed., *China,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Soviet Union: Tripolarity and Policy Making in the Cold War* (New York: M.E. Sharpe, 1993); Stephen Kotkin and Wolff, *Rediscovering Russia in Asia: Siberia and the Russian Far East* (New York: M.E. Sharpe, 1995)。

註五三：Walter A. McDougall, *op. cit.*, pp.26-29.

註五四：主要的理論經典著作係 Kenneth N.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Reading, MA: Addison-Wesley Publishing Company, 1979); Paul M. Kennedy,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 *op. cit.*; George Modelski, "The Long Cycle of Global Politics and the Nation-State,"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Vol. 20, No. 2, April 1978, pp.214-238; George Modelski, *Long Cycles in World Politics* (London: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87); Robert Gilpin, *War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1).

註五五：Paul M. Kennedy,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 *op. cit.*, pp.563-538.

註五六：Ibid., pp. X VI- X X IV.

註五七：George Modelski, *Long Cycles in World Politics*, *op. cit.*; George Modelski, "The Long Cycle of Global Politics and The Nation-State", *op. cit.*, pp.214-235.

註五八：分計：全球戰爭時期 (global war)、世界強國競逐時期 (world power)、權威喪失時期 (delegitimation)、權力分散時期 (deconcentration) 四個階段。

註五九：George Modelski, *Long Cycles in World Politics*, *op. cit.*, pp.30-31.

註六十：Ibid., p.93.

註六一：George Modelski: "What Is Evolutionary World Politics?" ,1997 .
<http://www.faculty.washington.edu/modelski/> 【2004.05.13.】

註六二：綜合參考 Robert E. Harkavy, "long Cycle Theory and the Hegemonic Powers' Basing Networks," *Political Geography*, Vol.18, 1999, pp.942-943; 秦亞青著,《霸權體系與國際衝突—美國在國際武裝衝突中的支持行爲(1945-1988)》(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頁111;倪世雄等著,《當代西方國際關係理論》(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1年),頁304-305。

註六三：Stanley Hoffmann, *Contemporary theor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Englewood Cliffs, New Jersey: Prentice-Hall, 1960), p.40.

註六四：Robert Gilpin, *op. cit.*, pp .23-32.

註六五：Ibid., pp.6-8, 182-185.

註六六：Ibid., pp.186-210.

註六七：Robert S. Ross, "The Geography of the Peace: East Asia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23, No.4, (Spring 1999), pp.117-118.

註六八：Randall L. Schweller, *Deadly Imbalances: Tripolarity and Hitler's Strategy of World Conquest*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8), pp. 16-19.

註六九：綜合參考 Paul F. Langer, "Soviet Military Power in Asia," in Donald S. Zagoria, ed., *Soviet Policy in Asia* (New Haven, Con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2); Robert A. Scalapino, "Asia in a Global Context: Strategic Issues for the Soviet Union," in Richard H. Solomon and Masataka Kosaka, eds., *The Soviet Far East Military Buildup: Nuclear Dilemmas and Asian Security* (Dover, Mass.: Auburn House, 1986); Harry Gelman, *The Soviet Far East Buildup and Soviet Risk-Taking against China* (Santa Monica, Calif.: RAND, 1982).

註七十：Walter A. McDougall, *op.cit.*, pp.34-39.

註七一：Ibid., p.1.

註七二：Ibid., pp.48-51, 53-54.

註七三：張錫模，〈地理的威權—日俄戰爭的地緣政治〉，《當代》，第214期，2005年，頁15-16。

註七四：綜合參考 Kenneth E. Boulding, *Conflict and Defense: A General Theory*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1963), pp. 230-232; Barry Buzan, "A Framework for Regional Security Analysis," in Buzan and Gowher Rizvi, *South Asian Insecurity and the Great Powers* (London: Macmillan, 1986), pp. 3-33.

註七五：Robert S. Ross, "The Geography of the Peace: East Asia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op. cit.*, pp.117-118.

註七六：Paul M. Kennedy,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 *op. cit.*, pp. 143-144.

註七七：Ibid., pp.17-24, 30.

註七八：Ibid., pp. 198-203.

註七九：Ibid., pp. 206-249.

註八十：一次大戰後，奧匈帝國、奧圖曼土耳其帝國、俄羅斯帝國、德意志帝國瓦解。

註八一：Paul M. Kennedy,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 *op. cit.*, p. 277.

註八二：Ibid., p. 357.

註八三：Ibid., pp. 361-366.

註八四：Ibid., pp. 436-437.

註八五：W. W. Rostow,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 Book Review and Correspondence," *Foreign Affairs*, 1988, Vol.66, p.865.

註八六：時殷弘，〈關於臺灣的幾項必須正視的大戰略問題〉，《戰略與管理》2000年第2期頁27。

註八七：Paul M. Kennedy,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 op.cit., pp.7-8；何耀光，〈對清末海防作為與國家現代化關係的認知 建構—國家發展與體系理論的理解〉，《我武維揚：近代中國海軍史新論》（香港：香港海防博物館，2004年），頁87-102。

註八八：Paul M. Kennedy,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 op. cit., pp.15-16.

註八九：Ibid., pp. 358-361.

註九十：Walter A. McDougall, op. cit., p.71.

註九一：Ibid., pp.91-92.

註九二：Ibid., pp.97-102.

註九三：Ibid., pp.160-161.

註九四：Ibid., p.166, 168, 172.

註九五：Ibid., pp.206, 209-210.

註九六：Colin S. Gray, *The Geopolitics of Super Power*, op. cit., pp. 45, 47.

註九七：Hedley Bull, *The Anarchical Society: A Study of Order in World Politics*(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0), pp.199-222.

註九八：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 *Papers relating to th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with the annual message of the president transmitted to Congress December 8, 1908* (Washington, D.C.: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12), pp. 510-512.

註九九：Walter V. Scholes, *United States Diplomatic History, Vol.2: Reading for the Twentieth Century*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73), p.55.

註一〇〇：此特殊的國際體系與秩序理解，係以西發利亞條約（the Peace Treaty of Westphalia）為開端，而形構的認知，即：「世界係由絕對排他的主權國家所形成，亦為解決爭端的主體，國家之間和平共處的最低限度原則係國際法，國家之間以武力解決爭端，武力運用的限制不受國際法約束，國家具有高度的行動自由」，見David Held et al., *Global Transformation: Politics, Economics and Culture*(London: Polity Press,1999), pp. 37-38.

註一〇一：Robert Cox, "Social Forces, State and World Order: Beyo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in Robert Keohane ed., *Neorealism and Its Critic*(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6), pp. 217-248.

註一〇二：Robert Crawford, *Regime Theory in the Post-Cold War World: Rethinking Neo-liberal Approaches to International Relations*(Dartmouth: Dartmouth Publishing Company,1996), p.57.

註一〇三：資中筠主編，《戰後美國外交史：從杜魯門到雷根》（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94年），頁10-12。

註一〇四：Stephen D. Krasner, "Structural Causes and Regime Consequences:

Regimes As Intervening Variable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36, No.2 (Spring 1982), p.186.

註一〇五：George Modelski and William R. Thompson, *Seapower in Global Politics*, op.cit. , pp.18-23.

註一〇六：Ibid., pp.134-140.

註一〇七：Ibid., p.76.

註一〇八：Robert Gilpin, op. cit., p. 112.

註一〇九：George Modelski and William R. Thompson, *Seapower in Global Politics*, op. cit., pp.17, 133-135.

註一一〇：John J. Mearsheimer,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New York: W. W. North & Company , 2001) , pp. 32-42.

註一一一：Hans J. Morgenthau , *Politics Among Nations : The Struggle for Power and Peace* (New York : Alfred A. Knopf , 1985), p. 31.

註一二二：Kenneth N. Waltz, “Evaluating Theorie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91, No.4, December 1997, p.915.

註一二三：John B. Hattendorf & Robert S. Jordoan, *Maritime Strategy and The Balance of Power: Britain and America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New York: St. Martin’ s Press, 1989), p.1.

註一二四：Ibid., pp.4-5, 8.

註一二五：Ibid., p.17.

註一二六：Walter A. McDougall, op. cit., pp. 389-398.

註一二七：綜合參考 Walter A. McDougall, op. cit., pp.426-427; Marilyn Blatt Young, *The Rhetoric of Empire; American China Policy, 1895-1901*, Harvard East Asian Series, Vol. 36(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8), p. 96; John Watson, *Diplomatic Memoirs*, Vol.2 (New York: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1909), p. 257; William R. Braisted, *The United States Navy in the Pacific, 1897-1909*(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1958), pp. 105-106; Melvyn Dubofsky, Athan Theoharis, and Daniel M. Smith,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Englewood Cliffs, New Jersey: Prentice-Hall, Inc., 1978), p. 370.

註一二八：綜合參考 Ian Nish, *The Anglo-Japanese Alliance*, op.cit.; Walter A. McDougall, op. cit., pp.428-429; John King Fairbank, Edwin O. Reischauer, and Albert M. Craig, *East Asia*, op. cit., pp. 555-556.

註一二九：Walter A. McDougall, op. cit., pp. 448-456.

註一二〇：綜合參考 A. Whitney Griswold, *The Far Eastern Policy of the United States* (New Haven, Con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38); Dorothy Borg,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Far Eastern Crisis of 1933 - 1938*, op. cit.; Akira Iriye, *Across the Pacific*, op. cit.; Michael A. Barnhart, *Japan Prepares for*

Total War, op. cit..

註一二一：Hedley Bull, *The Anarchical Society*, op. cit., p.97,102.

註一二二：Mark Curtis, *The Great Deception: Anglo-American Power and World Order* (London: Pluto Press, 1998), p.17.

註一二三：相關論述參見 Zbigniew Brzezinski, *The Choice: Global Domination or Global Leadership*(New York: Basic Books,2004); Robert Kagan, *Of Paradise and Power: America and Europe in the New World Order*(New York: Alfred A.Knopf,2003); Robert Kagan, "Power and Weakness," *Policy Review*, No. 119, June/July 2003, pp. 28-46.

註一二四：David A. Rosenberg, "Process the Realities of Formulating Modern Naval Strategy," in James Goldrick and John B. Hattendorf, eds., *Mahan Is Not Enough: The Proceedings of a Conference on the Works of Sir Julian Corbett and Admiral Sir Herbert Richmond* (Newport, R.I.: Naval War College Press, 1993), pp.141-175.

註一二五：綜合參考 Akira Iriye, *Across the Pacific*, op. cit. ,pp.207-208; Michael A. Barnhart, *Japan Prepares for Total War*, op. cit., pp. 67-75, 91-94, 154-156, 198-203; Robert Scalapino, "Southern Advance: Introduction," in James William Morley, ed., *The Fateful Choice: Japan' s Advance into Southeast Asia, 1939 - 1941* , op. cit., pp. 121-123.

註一二六：E. H. Norman, "The Genyosha: A Study in the Origins of Japanese Imperialism," in Jon Livingston et al. eds., *The Japan Reader*, Vol.1,(New York : Pantheon Books, 1973), pp.355-367.

註一二七：Marlene Mayo, "Attitudes toward Asia and the Beginning of Japanese Empire," in Jon Livingston et al. eds., op.cit., pp.214-217.

註一二八：James Crowley, "Creation of An Empire, 1896-1910" , in Jon Livingston et al. eds., op. cit., p.225.

註一二九：Akira Iriye, *Pacific Estrangement: Japanese and American Expansion, 1897-1911*(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2), p. 47.

註一三〇：J. Charles Schencking, *Making Waves: Politics, Propaganda, and the Emergence of the Imperial Japanese Navy: 1868-1922*(Palo Alto,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p.3

註一三一：Ibid.,pp.223-225

註一三二：Ibid., p.222

註一三二：Dorothy Borg, *Shumpei Okamoto, Pearl Harbor as History: Japanese-American Relations 1931-41*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73), p.239.

註一三四：Ibid. p.210.

註一三五：Walter A. McDougall, op. cit., pp.479-480.

註一三六：Ibid., pp.529-530.

註一三七：Ibid., p.567.

註一三八：J. Charles Schencking, op. cit., p.202

註一三九：Dorothy Borg, Shumpei Okamoto, op. cit., p.103.

註一四〇：綜合參考 Ian Nish, *The Origins of the Russo-Japanese War*, op.cit.; Michael A. Barnhart, *Japan Prepares for Total War*, op. cit.; James William Morley, *The Japanese Thrust into Siberia, 1918*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57) ; John King Fairbank, Edwin O. Reischauer, and Albert M. Craig, *East Asia*, op. cit., pp. 555-556, 692-693, 755-756.

註一四一：John E. Wills, " Maritime China from Wang Chih to Shih Lang: Themes in Peripheral History," in Jonathan D. Spence and John E. Wills Jr. eds., *From Ming to Ch' ing: Conquest, Region, and Continuity in Seventeenth- Century China*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9).

註一四二：曹永和，〈明洪武朝中琉關係〉，《中國海洋發展史論文集》(三)（台北：中央研究院社會科學研究所，1990年），頁338-344。

註一四三：鈕先鍾，《西方戰略思想史》（台北：麥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95年），頁396-398。

註一四四：此係美國總統麥金萊（William McKinley）在其國情咨文中所宣稱，見 Charles S. Campbell, Jr., *Special Business Interests and the Open Door Policy* (New Haven, Con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51), p. 46.

註一四五：Robert S. Ross, "The Geography of the Peace: East Asia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op. cit., pp. 81-118.